

●高红

文献编目规则兼容化探索

摘要 编目规则修订的动因是多方面的。一元化的信息规则成本高昂,难以适应文献量剧增的现实,而兼容化是文献编目规则统一化、规范化的出路之一。探索了文献编目规则兼容化的历史原因、需考虑的因素、须遵循的原则及可能的实现模式。参考文献3。

关键词 文献编目 编目规则 规则修订 编目规则兼容化

分类号 G254

ABSTRACT There are diversified causes for the revision of cataloging rules. Unified rules will have high costs, and are hard to meet the reality of rapid growth of information.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compatibility is one of the ways out for the unific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document cataloging rules. She analyzes historical background, points out problems to be solved, and proposes some pattern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ompatibility of library cataloging rules in China. 3 refs.

KEY WORDS Document cataloging. Cataloging rules. Revision of rules. Compatibility of cataloging rules.

CLASS NUMBER G254

近年来,在图书馆文献编目领域围绕“呼唤图书馆编目原则统一”的话题不断有大量文章出炉、各类型会议研讨,把原来很多人私底下抱怨的国内编目规则问题摆到了桌面上,在业界引起很大反响。2006年11月,中国图书馆学会标引与编目委员会召开了编目专家会议,将这个问题推向顶峰,并达成一些共识。2007年即将走过,各类图书馆的编目实践依然是各走各的路,真正实现编目原则统一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少?这无疑值得引起深思。

1 编目规则修订的动因

1.1 目录职能的演变

在西方编目史上,目录职能经历了从“财产清单”向“查检式目录”的飞跃。体现这一变化的书目记录结构表现为:从无序的、单一的排列次序到以著者为中心的、多途径的检索;书目著录从极不规范的罗列著者、书名到较为统一的著录图书的著者、书名、出版者、版次等书目信息。

中国传统编目与西方编目的理论与实践差异较大,最根本的差异在于目录学的目的不同。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目的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西方目录学的精髓则在于方便地获取文献。由于目的不同,中西编目所采取的方法也就各异。为达到辨考学术源流的目的,中国目录学重分类,重小序,重提要;而为了方便地获取图书,西方目录学则重编目、重索引、重排序法、重书目控制。

随着目录活动的标准化、机读化和网络化,信息检索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录的标识职能日益受到重视。ISBD、ISBN、ISSN、MARC的出现便是这一职能的直接体现。中西编目的目的正在趋向同一,中西编目正在不断的融合中相互取长补短。特别是随着FRBR模型的提出,两者更有了殊途同归的味道。

1.2 编目理论与编目实践的矛盾运动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自身都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动,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编目理论与编目实践同样存在着辩证依存的关系。一方面,编目实践所积累的经验材料是编目理论的直接根据和土壤;而另一方面,当一种编目理论形成后,又会进一步指导编目实践,从而在实践中发现新的矛盾。总之,编目学的整个发展过程都是在编目实践与编目理论的交替推挽下前进的。

1.3 编目思想的百家争鸣

不同学术思想的争鸣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不断给编目学增添新的内容。英美编目史上发生的多次“论战”,最终否定了保守的“查检式目录”派,将目录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指南。

1.4 不断创新的精神追求

历史不能割裂,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连续性,总是在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并在继承、积累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堪称传统编目学经典作品的《字典

式目录规则》就是克特在继承、总结前人编目思想、编目实践的基础上诞生的。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图书馆学者及时推出新的编目方法、编目理论和模型, MARC格式的出现就是图书馆人紧跟社会需求变化的最好例证。此后,各国学者又针对机读目录网络化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现在,不满足于现状的编目学家开始借助新的信息管理理念,试图通过元数据、实体/关系模型等新的路径重新编码信息资源,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管理。

1.5 其他学科的影响渗透

随着学科间交叉、渗透趋势的日益加强,编目学领域也越来越多地引进其他学科的技术和方法。如将计算机网络技术引入编目领域,彻底改变了编目方法和检索环境;将控制论引入书目活动,产生了“书目控制论”;将数学方法、统计学方法引入目录学中,产生了“文献计量学”。这样就使编目学进一步在深度、广度上得以拓展,进一步实现了定量化和定性化,以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

2 编目规则兼容化的历史原因

纵观文献编目的发展历程,编目规则主要经历了由个人独立编制到集体编制、从一馆规则向全国性和国际性规则演变的历程,合作、折中与兼容贯穿了整个发展过程,可以说,兼容化是文献编目规则实现统一化、规范化的出路之一。

2.1 多种编目规则的并存

西方图书馆编目工作是以点带面,逐步深入开展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统领全国,对外统一发行书目卡片,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打下统一的良好基础。我国文献编目工作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并不慢,似乎一起步就以面带点地开展起来,在《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和 CNMARC 出台前已形成多种标准共存的局面(如公共馆系统、高校系统、军队系统等),没有考虑或较少考虑编目规则统一、兼容的问题。直接后果就是同一领域存在多种不同的编目规则,不同团体执行各自的标准,从而导致不同数据库之间检索结果的极大差异,直接影响到用户的利益。

2.2 编目规则与编目格式的分离

计算机环境下,数据编制主要依据编目规则和编目格式,前者遵循文献著录标准和编目条例,后者遵照 MARC 格式。目前这两种规则一般采用分别编制和分别出版的模式,而编目员在实际工作中需要的是

将两种规则结合使用的编目细则。

我国文献编目标准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陆续诞生了一批 GB3792 标准。“实行中外文目录的统一、图书馆与文献情报部门目录的统一、各类型各载体文献目录的统一、不同载体目录的统一,始终是我国文献编目工作标准化的指导思想。”^[1]四统一的核心是中外文目录的统一,即向国际标准靠拢,实现文献编目的国际化、统一化。由于历史原因, GB3792 系列标准虽然接受了 ISBD 的思想,但依然存在有与国际标准不一致的编目痕迹。而研制于80年代的 CNMARC,由于当时国内缺乏计算机编目实践环境,因此几乎全盘接受了 UNIMARC,而 UNIMARC 是以西方文献为依据制订的,与中文文献传统的著录和标目形式有一定差异。如外国个人名称的标目形式,中文习惯以汉译姓为主标目,将原文姓名著录在其后的圆括号内,这与西方的标目形式不同, UNIMARC 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各家编目机构按自身的理解来做,编制的书目数据难免产生差异。

2.3 用户对目录需求的多样性

各类型图书馆最初都是出于自身的经验和需要来编制本馆目录,早期的编目规则始终未能跨出本馆的大门,因此需求相对单一,规则相对容易统一。但当编目规则推广到整个行业时,由于各馆性质、任务、读者对象、资源保障环境的差异,对目录的需求也呈现多样性,必须兼顾各馆的不同需求。目录的编制标准应以为用户服务为出发点,将涉及前沿学科、宣传教育重点、需求热点等文献定为揭示重点。编目员应合理使用编目资源,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如对内容单一的文献(如小说)编制基本目录信息,对用于研究目的的目录,适当编制统一题名。

2.4 认识和习惯差异

在纷繁复杂的文献面前,编目规则从总体上来说,是滞后的,或者说存在相当多的“盲区”,这需要编目员根据编目规则背后的原则和现存的相关规则做出自主理解和判断。究其原因,其一,目前出版业的书目信息刊载不规范,如由于排版方式导致题名不清晰,缺乏责任者介绍等;其二,任何规则都无法穷尽编目对象带来的变化。因此,编目员的自主理解和判断是必须的,认识差异以及各编目机构由于惯例而形成的习惯差异在所难免,而对差异的收集和汇总或许正是进一步实现标准化的基础和前提,与标准化不相矛盾。

2.5 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功能差异

由于各图书馆采用不同的集成化管理系统,编目模块的功能也因此而异。如在国内图书馆使用较广泛的 INNOPAC、ILAS 等系统与国家图书馆使用的 ALEPH500 就存在差异,因而在对丛编字段的处理上出现较大差异,影响到检索。所以,规则的制订还应遵循通用性原则,不可以本地应用影响编目规则的制定。

3 编目规则兼容化可能考虑的因素

3.1 继承与变革

在继承基础上的不断创新是编目规则修订首先要考虑的,如堪称西方传统编目学经典作品的《字典式目录规则》就是克特在继承、总结前人编目思想、编目实践的基础上诞生。2008 年即将出台的 RDA (未来数字环境下资源著录与检索的新标准),同样包含了 AACR2 的大量文本内容,而非重新编写。因为 AACR2 在其 25 年的不断完善、修订历程中,融合了世界各国不同的编目思想,这一传统的编目规则在今天依然有其重要意义和应用价值。而我们的目标之一就是使采用新标准创建的书目记录与采用旧标准的记录共存共融,因此,编目标准的兼容性与延续性至关重要。此外,我们还要维护与国际其他标准之间的协调,如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等。

3.2 不同种类目录的并存

在我国,各语种的编目遵循不同的编目规则,形成了分立式的目录体系。虽然不同编目规则的著录都依据 ISBD,但名称和主题标目由于各国的文化差异,各自都规定了不同的规则。西文是将所有字顺标目(题名、责任者等),甚至不同文种文献的字顺标目设置在同一目录中,从而形成多款目的字典式目录。其显著特点是排序性强,便于浏览检索。中文目录是将题名、责任者、主题各自分立,对题名、责任者的排序不够重视,在机检环境下不便于读者浏览检索。

3.3 图书馆自动化软件的适应性

机读目录功能的实现必须依赖于软件的支持,如规定信息源中的题名、出版者为繁体字时,是按繁体字还是简化字著录,目前国内不同编目机构的做法是有分歧的。以港台图书为例,CALIS 联合目录规定在 200 字段著录繁体字,在 518 字段著录简体字,很多图书馆由于检索系统对繁体字不兼容,只以简体字著录,由此带来的检索差异需要考虑。

3.4 读者与用户利益

在目前多种著录规则和执行细则并存的客观情况下,应从实际出发,妥善考虑国际标准化与本国标准化的关系,最大限度满足读者需求。如国家图书馆中文编目长期缺乏名称标目细则,但在实践中已形成了一定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已为读者接受,似乎已成惯用形式。因此,对于名称标目总原则应是在适当照顾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或编制一般规则,或编制交替规则,并补充特殊规则。严格执行一般规则是基本,保证名称标目的一致性,同时也应考虑到国际规范档数据交换可接受性。

用户利益还要求在编制规则时,心中时时想到读者,时时考虑以下问题:①多数研究表明,读者一般使用较少的著录元素,许多项目更是偶尔使用或根本不用。目录中最常用到的是著者、题名、版本、出版者、出版年和主题,即少数常用的项目就可满足多数读者的需求。②多数读者将目录作为检索工具,习惯上会首先用题名、著者检索。③读者希望目录中增加关于图书内容的说明,希望目录能够提供更多的内容分析、摘要,以帮助区分和选择图书,部分读者还希望增加著者的背景说明或其所属的学派。④读者喜欢简略型目录,因为它们容易使用,检索速度快。⑤读者用主题检索时,通常不是太多就是太少,而这也是目录聚集目的所未能预想到的结果。⑥读者使用的检索词与检索系统采用的规范词很难对应。目录是为实际需要而存在的,而使用者的期盼与使用行为正是目录得以改进功能的重要参考,因此,编目规则能否符合用户方便性原则,是今后不能忽略的一个研究重点。

3.5 条例与手册的关系

处理好条例与手册的关系,即条例的内容只需要满足大多数图书馆的一般编目需要,而各专业图书馆可在此基础上制订符合自己特殊需要的编目手册。随着编目工作的发展,人们普遍意识到有必要探求编目条例的理论性和原则性,感到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指导编目实践的总体理论原则和在基本原则指导下的简明规则。柳别斯基在《编目规则和原则》中指出,过去编目工作“只注重著录规则,却忽视了规则以上的原则”。他强调,如果没有原则,各种规则的制定必定是任意的,有时可能是相互矛盾和重复的,编目员对编目中产生的具体问题就会感到无所适从。无论在西方还是在我国,编目规则的修订可以说是过去、现在甚至未来图书馆界所必须面对的任务,人们

更应注重编目规则背后原则的解释,否则就会造成面对新版规则,专业馆嫌内容不够而公共馆又嫌内容过多之后果。

4 编目规则兼容化的原则与实现模式

4.1 国际化与民族化的统一

编目工作国际化是大势所趋,而民族化与国际化也并不是截然对立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找到真正民族化的东西,从而推进国际化。近几年,国内编目界关于规范化、统一化的论争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④ 规定信息源的选取,即题名页与版权页的争论。[影响检索]

⑤ 题名与责任说明项的差异,如并列题名的著录问题等。[不影响检索]

⑥ 版本说明项,即“第2版”与“2版”的著录差异。[不影响检索]

⑦ 丛编项的著录差异,国家图书馆因建立丛编的高层记录而启用46X字段,而CALIS不建立丛编高层记录,故启用410字段。[影响检索]

⑧ 责任者名称标目前冠以朝代、国别名称,这是否是中文出版物的特点,并符合一般读者的认知习惯呢? [影响检索]

701 #0 \$ c(美) \$ a 阿吉翁 \$ c(Aghion, Philippe) \$ 4 著(国图)

701 #1 \$ a 阿吉翁, \$ bP. \$ g(Aghion, Philippe) \$ 4 著(CALIS)

图书馆呼唤编目规则统一的呼声已久。实践表明,一元化的规则成本高昂、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位西方目录学家曾经说过:唯独目录是永远存在缺憾的,分歧无处不有,关键看你如何对待。对一些细节不同的认识和处理是自然的,但差异的底线是不影响用户的检索使用。其实对民族性的理解笔者是有疑惑的,编目的目的是为了检索,检索入口词的一致及读者利益是首要目标,非要在一个字段中去体现所谓民族性大可不必。因此,“在研究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想法,并反对以中国特色为由而排斥国际惯例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学风”^[2]。

4.2 管理机制的保障

这里有几个层面的含义。其一,编目规则的制定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它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几代人共同的努力,需要在一个前赴后继的学术共同体中,按照一定的学术范式,慢慢地积累,有学脉可寻,有传统可依。其二,设立由全国各个系统的理论专家、实践

英雄组成的编目规则修订委员会,代表全国编目工作者的共同利益。其实,规则的统一关键还是要通过人的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无所谓高深的技术,完全是一个管理和协调的问题。建议由权威机构(如文献标准化委员会、中国图书馆学会编目与标引委员会)来促进此项工作,从机制上予以保证。

4.3 描述和检索标准简洁化

规则的修订应遵循简洁化原则。所谓标准简洁,一是要鼓励各种元数据都采用同一个内容标准,正如RDA的修订,它将被作为资源描述的唯一内容标准,可兼容更多的元数据框架标准;二是希望编目规则更加强调整则以上的原则,既适用于中国大陆的中文文献编目,也兼容西方大部分国家地区的中文文献编目。

4.4 相关规则具有连贯性、一致性和协调性

编目工作是一项承前启后的基础性工作,受到诸多标准、规范和业务规章制度的制约,因此,应重视相关规则的连贯性、一致性和协调性。其一,避免按文献类型阐述规则造成的重复性或者可能发生的冲突,使得不同载体不同类型文献的著录规则具有高度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有助于编目员把握对交叉性资源的描述。其二,注重对相关已有规则条款的规范性引用,如《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1.0.6.2条款规定:“计量单位等效采用GB3100《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新版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中遵循的BG/T 4480语种名称代码,等效采用ISO 639。其三,对于不适合引用的标准,应尽可能参照相关标准予以本地转化。如《中国文献编目规则》(1996)规定,一般资料标识应根据国家标准GB 3469-83《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著录,即用GB 3469-83中的一般文献类型标识来替代一般资料标识。但在我国,“一般资料标识若用GB3469-83中的一般文献类型标识来标识,一是无法满足所有文献类型的著录(如GB 3469-83中就无“电子资源”等一般文献类型标识);二是不能与CNMARC的200\$b的要求相匹配”^[3]。因为200\$b子字段要求以编目机构所采用的语言和形式来说明文献所属的资料类型,而这些资料类型又需要与ISBDs的一般资料标识相对应。但在ISBDs中,一般资料标识与专著、连续性资源、测绘资料、乐谱、电子资源、图示资料、声像资料等并非一一对应。因此,宜以GB3469-83为基本依据,选取所需数据元素予以转换使用。其四,对于编目标准中遗漏和缺乏明确规定的內容,编目机构可视具体情况个别引用。对于需求各异的信息机构和用户,文献

编目规则应强调版本的基础性。对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修订指导性条款和意见。

4.5 标准化原则

所谓标准化原则,是指无论在实际编目工作中还是在编制编目规则或条例中,凡是已有相应标准的,就应按照标准处理。目前,编目方面的标准有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如 ISBDs 和 UNIMARC 等)。选择标准时,应该考虑以最新的国家标准,尤其是最新的国际标准为依据,因为后者更具国际化且不断在更新。关于编目国际化问题,在现今普遍实行联机联合编目的环境下,各馆编目人员应具有国际视野,因为我们的记录不仅用于国内数据交换而且也被用于国际交换。

4.6 重视编目条例与机读格式的融合

MARC 格式的一体化,需要编目规则不断补充新规则和样例,加强规则与格式的有机结合。同时,编目规则的修订,也需要 MARC 格式及时更新和修订,如 MARC21 每季度都在更新并在网上发布。而 CNMARC 已近四年未曾修订,文献数量和类型的海量增加以及文献检索功能的完善,都需要 MARC 格式及时更新,以更好地满足对文献信息的有效揭示。

4.7 编目理念从教条主义向实用主义转型

今天,大多数编目员都囿于教条主义的模式中工作,他们墨守成规,希望编目条例包罗万象,主观上要求每种编目工作中所遇到的具体情况都能在条例中找到完全一致的确切答案。其出发点认为,条例对编目工作的指导是依靠加强条例的复杂性来实现,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两大缺陷:其一,编目实体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千变万化的,任何一部详尽的编目条例都无法穷尽一切可能出现的客观现象,都无法取代编目员的经验和判断,最终只能顾此失彼;其二,由于教条式理论试图从细节上包罗万象,提供一切编目问题的具体答案,势必造成客观上不断增设新条款,不断对原有的条款进行修订,破坏了编目工作的连续性、一致性和稳定性,使编目人员无所适从。实用主义则

强调不同类型图书馆的不同需求,提倡标准和规则应针对不同类型的图书馆而制订。具体而言,编目规则要有其特定的使用环境,要有一定的文献保障基础;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应采用不同的著录级别,即标准级、简化级和详尽级,在条例的使用中应结合编目员的推断及经验灵活处理。因此,编目员的思想转型非常重要。较好地掌握编目原则和目录原则,对编目中产生的具体问题就不会感到无所适从,对差异的理解也会有新的视野。否则,再统一的规则摆在面前,也会理解得五花八门。

4.8 提倡严谨、民主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所谓严谨的学风,即要在研究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想法,并反对以中国特色为由而排斥国际惯例;民主的作风,即在编制规则、主题词表和/或分类法的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倾听来自不同角度的声音和意见,并最终求得共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即编目实践的发展离不开编目理论的创新,但反对建立虚幻理论和不研究理论的经验主义。”^[2]

最后引用卡特在《字典式目录》中的话语做此文的结尾:“编目是一门精湛的技艺,任何规则都无法替代编目员的经验和优秀的判断。相反,应将成熟的经验总结为编目规则。”

参考文献:

- [1] 黄俊贵. 文献编目工作[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 [2] 王松林. 消除编目实践差异,探求编目工作原则:中国图书馆学会标引与编目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纪要[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07(1).
- [3] 王松林等. 从《国际编目原则声明》看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的修订[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7(1).

高红 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代理主任,副研究馆员. 通讯地址:北京中关村南大街33号. 邮编100081.

(收稿日期:2007-10-24)